

## 21 世纪的亚洲社会与社会学

陆 学 艺

第六届亚洲社会学大会的召开正值世纪之交,回顾 20 世纪亚洲社会的变迁,展望 21 世纪亚洲社会和社会学的前景,进行历史的比较和反思,自然成为这次大会各个专题讨论的总体思想背景。但是,新旧世纪的交替,本来是反复出现的寻常之事,所谓“跨世纪的思考”并非每一次都具有值得人们普遍关注的重大主题。那么,当前亚洲社会是否发生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变化,足以引起世人瞩目,从而成为亚洲社会学家不可回避的重大议题呢?

众所周知,自 1500 年以来,全球意义上的“世界体系”开始形成,西欧和北美相继成为这个体系的中心。到 20 世纪前期,其间 400 多年,对世界进程具有全局性影响的事件几乎都发生在大西洋沿岸,如英国工业革命、法国大革命、德意志民族国家的形成与统一、美国大国地位的确立、俄国十月革命。亚洲的绝大多数国家长期被排斥在这个体系的“边缘”,沉沦而停滞。然而,20 世纪下半叶,越来越多的亚洲国家鱼贯式地进入了历史的“快车道”,开始了东方的振兴。最近 30 年,美欧国家几乎是在漫不经心之中突然被亚洲的奇迹所震惊:亚洲崛起了。

亚洲的崛起,首先是经济奇迹,但又不仅仅是经济奇迹。从经济总量上看,据世界经合组织预测,亚太地区的产品 1990 年占世界的 1/4,到 2000 年将占世界的 1/3,到 2040 年将占世界产品总量的 1/2。从经济增长速度上看,据亚洲开发银行 1992 年判断,亚洲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率 1992 年为 6.5%,1993 年为 6.7%,而同期世界平均增长率分别为 1.8% 和 3.3%,日本经济研究中心认为,亚洲平均经济增长率在进入 21 世纪以后仍可保持在 4% 以上。从经济合作情况来看,目前亚太地区经济合作和一体化的进程正在加快,亚太地区内部贸易额已占总贸易额的 65%,超过了欧洲共同体国家的内部贸易额(62%),也超过了亚太地区与美国的贸易额。亚洲的经济成就与欧美的经济停滞衰退恰成鲜明的对照,对此如何解释?那种认为亚洲经济只是西方经济的“延伸”和“依附发展”的观点已经不攻自破了,人们开始注意东方式的企业组织、管理制度和经济发展的的人文环境。这预示着 21 世纪的世界经济将可能向新的经济增长模式过渡、向新的增长中心转移。

亚洲的崛起具有重大政治意义。这不仅指世界政治的两极对立格局正在被多极化格局所取代,也不仅是指占世界人口总数 60% 的亚洲人民势必在 21 世纪的世界政治中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且是指政治概念的主要涵义将由霸道政治向王道政治转移。那种以为不是英国主宰一切就是美国主宰一切,不然就是什么西方大国主宰一切,以侵略和扩张、征服和掠夺为特征的强权逻辑将被摒弃,崛起的亚洲将带给世界一种逻辑:不是以大欺小、以强凌弱,而是“以德行仁”,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政治。

亚洲的崛起是深刻的文化现象。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文化与 21 世纪世界进程的关系,也因亚洲的崛起而格外引人注目。世界存留至今的文明,不论是如汤因比(A. Toynbee)所

说的六种,还是如亨廷顿(S. P. Huntington)所列的八种,多数是亚洲人创造的;具有世界性的几大宗教也几乎都发源于亚洲。但是,东方文化到底是现代化的促进因素,还是东方落后的重要根源?需要重新研究,不可简单从事。韦伯(M. Weber)关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关系的见解,也许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西方工业文明,但对亚洲特别是东亚崛起的文化原因,看来需要另作解释。在当代人中,美国哈佛大学的亨廷顿提出:21世纪世界冲突的主要根源将不再是意识形态,也不再是经济,而是文化即所谓“文明的冲突”,这即使有些偏颇,尚可算是一家之言,但他关于儒家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结合会造成“威胁”的说法,则是出于对东方文明的误解。东方文明就其主要倾向而言,不是崇尚对抗,而是崇尚中和,不是向外扩张,而是向内协调,亚洲之所以既能取得高速增长,又能保持社会基本稳定,正是东方文化这一特点的明证。由悠久文化的积累和现代文明结合的亚洲发展模式,可说是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比较优秀的模式。经济增长与社会稳定、社会变迁与人际和谐相辅相成的发展模式,正是亚洲对于21世纪的主要贡献。探究这个发展模式的文化底蕴,对亚洲社会学家来说是责无旁贷的。

女士们,先生们,亚洲的崛起,是涉及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全面而深刻的社会变迁。讨论亚洲崛起的社会学意义和亚洲社会学家的历史使命,应该是本次大会的主题。

作为亚洲崛起进程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中国自1978年开始实行邓小平提出的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取得了不仅对本国而且对亚洲和全世界都是可喜的和有益的进步。从1978—1994年的16年间,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为9.4%,到本世纪末的未来几年内仍可保持在7%以上。与此同时,中国社会全面加快了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从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化进程,这个进程伴随着利益格局的调整、观念文化和行为方式的转变,就其规模和深刻程度而言,是当年西方社会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所难以比拟的。在中国的发展中,有两条基本的经验:一是坚持从本国的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不照搬西方的模式;二是经济和社会必须协调发展。前者决定了社会学的发展方向,而后者决定了社会学的重要地位。中国和整个亚洲社会的伟大变迁,为社会学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良机,既然随着西方世界的兴起,产生了社会学这门学科,那么,亚洲崛起对于社会学的意义也是不容低估的。

亚洲的崛起不是区域性的现象,它对世界进程将发生全局性的影响。同样,亚洲的崛起对西方社会学提出的质疑也不是局部性的,而是全局性的,不是表面的而是实质性的。它给亚洲社会学家提出的任务,也不只是要去描述和解释具体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从根本上说,是要求从亚洲社会的实际出发,去总结和概括亚洲社会发展变迁的内在规律,去探索和创造21世纪亚洲社会学的新模式。

亚洲社会的巨变和世界各国发展的经验,为亚洲社会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厚的基础,同时也对西方社会学的某些基本概念和概念逻辑提出了挑战。

例如,个人与社会是社会学的一对基本范畴,西方社会学或者坚持个人本位,或者坚持社会本位;或者强调个人活动对于解释社会的根本性,或者强调社会结构对于个人的先在性;总之,以不同的形式预设了个人与社会的分离和对立。作为这种概念逻辑的一个推论,亚洲社会就既可被批评为压抑个人积极性,也可被认为是结构和制度的低效率,果真如此的话,亚洲的经济奇迹是从哪里来的?实际上,在亚洲的发展过程中,群体或集体的存在常常表现为培育和支持个人积极性的环境和条件。与西方社会家庭地位的降低和家庭关系的松解相反,在亚洲,家庭、家族等等起到了降低交易成本、舒缓竞争带来的紧张、调解社会基本矛盾的作用,当然,

确实也有加重社会区隔的弱点。个人与社会之间较多的联系中介和联系网络,植根于血缘、历史和文化深厚基础的人际关系或社会资源,对社会发展既可能起积极的作用,又可能有负面影响,其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使西方社会学明确而简单的基本假设的解释力显得相形见绌。

不仅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而且在国家与社会、经济与社会、传统与现代性、城市与乡村、人与自然以及在方法论方面的主观与客观、宏观与微观、冲突与均衡、经验与理论、理性与非理性等等概念的关系上,也都有类似的情况。亚洲社会的实际情况和行为逻辑与这些概念关系、概念旨趣、概念逻辑之间总有某种程度的不贴切、不自然、不合拍。如果这些情况只是发生在一些具体概念上,那还不足为怪,但既然上述这些概念关系从不同侧面涉及到了西方社会学的解释模式,那么我们提出探索和建立从亚洲社会实际出发的社会学模式就是理所当然的了。何况,西方社会学本来就有三大理论传统,到了现在,更是呈现出所谓“多重范式”的局面,不可能定于一尊。法、英、德、美的社会学从来都是各有特点,唯其有特色,才能对社会学有所贡献。这些年,西方社会学家也在那里议论原有模式的“危机”,进行自身反思,探索新的思路,亚洲社会学家就更没有必要奉西方社会学为主臬,束缚自己的思想,等待西方社会学家来回答亚洲社会的发展问题,跟着人家,人云亦云。有鉴于此,我们提出创造亚洲社会学新模式,是既合理,又合情,全在情理之中。

女士们,先生们,有亚洲的崛起,就必有崛起的亚洲社会学。一种立足于亚洲现实,植根于亚洲文化,能够解释亚洲崛起之奥秘,又能具有世界性普遍意义的社会学,必然借亚洲崛起的机缘应运而生!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亚洲社会学新模式”,它是亚洲的,也是世界的;它将以自己的鲜明特色和普遍意义而自立于 21 世纪的世界社会学之林。

动员亚洲社会学家投身于对 21 世纪亚洲社会发展变迁的研究和总结,投身于对 21 世纪亚洲社会学新模式的探索和创造,统一认识、鼓舞士气、明确目标、加强合作,就是第六届亚洲社会学大会的任务。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第一,要继承和发扬 20 世纪亚洲社会学家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求得对亚洲社会的透彻了解;还要大力开展对西方社会、对社会类型的比较研究,准确而深刻地把握亚洲社会的特质。第二,加强对东方社会思想的研究。自古以来,东方思想传统就比西方思想传统更重视社会与人生,社会思想遗产比西方更丰富。而且,如果说西方社会学是提供了一种概念逻辑,那么,东方社会思想则是活生生地体现在东方人的行为之中的“生活逻辑”。这是亚洲社会学的根。用这条根去汲取东方人生活经验的营养,去汲取西方社会学的营养,才能有 21 世纪亚洲社会学的繁茂大树。第三,全面理解、系统研究西方社会学。我们既要研究西方社会学的经典理论,又要了解它在当代的最新进展;既要关注西方学者关于西方社会的研究,又要注意他们对东方社会的研究成果。必须明确,亚洲社会的崛起,是世界经济社会整体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世界历史发展长河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必须冲破西方中心主义的禁锢,又要防止东方封闭主义。亚洲的崛起是东西方学者共同关心的大事,亚洲社会学的崛起也离不开东西方社会学家的沟通、交流与合作。第四,努力推动亚洲各国社会学家经常性的交流与合作更是当务之急。21 世纪亚洲社会学家的目光将从较多地注视西方转移到注视本地区社会学的动向和发展。由于历史和文化的的原因,亚洲社会学家面临的问题更为接近,更容易互相借鉴、互相启发,因而互相交流将趋于频繁。

正是本着这个意愿,我们在亚洲各国朋友们的大力支持下筹办了本届大会。今天,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副委员长、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雷洁琼教授因公务前往外地,不能亲临大会,他们专门给大会发来贺辞,表达了对亚洲社会学事业的关心和支持。费教授、雷教授既是三四

十年代中国社会学的主要开拓者,又是七十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学恢复和重建的主要领导者。中国社会学具有注重社会调查、理论结合实际优良传统,中国社会学界对“只有在本国的土壤里才能生长出中国的社会学”(费孝通语,1985)抱有明确的信念。近十几年来,我们开展的小城镇研究、城市家庭研究、农村改革和农民问题研究、社会结构转型研究、阶级和阶层研究、社会指标研究、社会分化和人口流动研究、社会学基本理论研究,等等,对国家决策和社会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赢得了社会的赞誉。目前,中国社会学的发展正值大好时光,我们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丰富实践做为学科发展的肥壤沃土,有一支素质较好、事业心较强、初具规模的专职和非专职的社会学研究和教学队伍。相信有中国特色社会学的形成和发展必将为亚洲社会学的崛起作出积极贡献。出席本届大会的中国社会学界愿意虚心向亚洲各国同行请教,相互切磋,合作交流,共同提高,增进了解,加深友谊。

本届大会有 200 多位亚洲社会学家欢聚一堂,盛况空前。为了便于交流和讨论,大会组织委员会经过磋商,拟定了六个题目:一、亚洲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二、亚洲的传统文化和社会结构;三、亚洲的工业化和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四、21 世纪亚洲的社会保障;五、21 世纪亚洲地区的家庭与生活品质;六、21 世纪亚洲社会经济发展、人口资源与环境问题。我们希望通过对这些问题的讨论,能具体地展示和理解亚洲崛起的社会学意义。

我们希望,第六届亚洲社会学大会将成为 21 世纪亚洲社会学崛起的奠基礼!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张志敏

---

(上接第 38 页)

4. Baudrillard, J. *In the Shadow of the Silent Majorities*. New York: Semiotext(e). 1988.  
*America*. London: Verso. 1988.
5. Blumenberg, H. *Work on Myth*. The MIT Press. 1990.  
Bourdieu, P.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eCerteau, M. 1977.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trans. by S. Rendall) Berkeley,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6. Elias, N. *What is Sociolog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8.  
*The Society of Individuals*. Oxford: Blackwell. 1991.
7. Game, A. P. *Undoing the Social: Towards a Deconstructive Sociology*. Open University Press. 1991.
8. Koselleck, R. *Critique and Crisis: Enlightenment and the Pathogenesis of Modern Society*. The MIT Press. 1988.
9. Lash, S. & J. Urry. "The dissolution of the social," in W. L. Wardell and S. P. Turner (eds.) *Sociological Theory in Transition*. Boston: Allern and Unwin, 95-109. 1986.
10. Lin, Y. S. *The Crisis of Chinese Consciousness*.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79.
11. Luhmann, N. *Essays on Self-Referenc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0.
12. Parsons, T. *The Social System*. New York: Free Press. 1951.
13. Zijderveld, A. C. *On Clichés*.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79.

责任编辑:张宛丽